

谁也不会否认,当下中国的文学艺术处于空前活跃或者说繁荣的状态;但谁也都感觉得到,文艺的现状并不令人完全满意。在数量的急剧膨胀、市场的热气腾腾背后,是普遍的降格以求和过目即忘,是大家隐遁、经典难寻。这已经成为我们的软肋和隐痛。原因众说纷纭,我以为,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文艺的审美理想出现了严重的缺失和畸变。主要的表现是:

低俗泛滥。这是最突出最明显的问题。一段时间中,网络、影视、图书以及大众娱乐场所中的低俗、鄙俗乃至恶俗现象比比皆是。网络上“芙蓉姐姐”、“凤姐”之类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台,以暴露身体、发布艳照、自揭家丑、制造负面新闻之类手法搏出名的事情频频发生,许多博文和帖子脏话连篇,粗口频出,形同随地吐痰和当众大小便;一些娱乐节目很少思想性、益智性,变成乐而乐、“愚乐”至上;文学创作中“欲望化叙事”、“下半身写作”仍乐此不疲,除了偷情还是偷情,三页不离性事;大众媒体中的交友、丰胸、壮阳等涉性广告十分露骨;一些歌厅和剧场中的节目,无论是北方的“二人转”还是南方的脱口秀,无论是荤段子还是脑筋急转弯,都鄙俗得不忍相看不忍相闻。以恶搞为卖点,拿肉麻当有趣。这股低俗之风,有时给人的感觉不只是偏离先进的前进方向的问题,而是背离了公序良俗、丧失了基本的道德底线的问题。

怪诞流行。早些年,“行为艺术”曾经前卫得吃死婴,钻牛腹,胡萝卜上套避孕套,这几年见得少了,但书法绘画领域的怪诞之风仍很盛行,以怪为美,以玄为尚。一些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对一些亚文化和畸形现象津津乐道。例如同性恋、性错乱、变性人、易装癖、虐待狂和受虐狂等等。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在一个社会中,存在这些现象并不奇怪,在私人空间中,我们应对此给予一定的理解与宽容,但作为公共媒体,有必要对之津津乐道、大肆渲染吗?我这样说,可能会被人批评认为“政治不正确”,但我坚持认为,在中国,对待大多数人的主流价值和个别群体的亚文化,还是应有所区别,这不是保守,而是持守之道,是恰如其分。

造假成风。诚信缺失是当代中国社会文化领域最大的问题。商业领域的造假蔓延到文艺界,假唱假演,假文凭假履历,假嘉宾假交锋,移花接木,PS,乃至赤裸裸的抄袭剽窃,成为顽症,以致见惯不惊,习以为常。连奥运会开幕式都可以假唱,连博士论文都可以购买,耸人听闻的推荐语,牛皮吹尽的广告词,过度的包装和签售会,在图书出版领域尤为常见,以至你经常以为买到一本惊世之作,原来是稻草一包。年年在搞诚信教育,可是虚假却无处不在,而且很少受到惩罚。

无耻无畏。东方文化本是一种耻感文化,一个人做了不道德的事、违背公序良俗的事、破坏行业规范和职业伦理的事、违法乱纪的事,至少要感到羞耻,感到愧疚,并有改正的愿望,这才是正常的文化心理。是之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也就是正确的非观、荣辱观。可是在当前的社会文化领域,我们看到的却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无赖、“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硬撑、“老夫不知信之,汝奈何”的痞子腔。法院判决为剽窃,可以大言不惭地说“绝不道歉”,而且得到粉丝的一片叫好;明明是弟子动粗打人,师傅却标榜为英雄,并且声称在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要带点狼性——这也正是《狼图腾》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过去有人只是说无知者无畏,现在是无耻者无畏。以堕落为美,以挑战公共道德底线为乐:这就是某些人的精神现状。古人念兹在兹的是非

之心、羞恶之心哪去了?在西方,越是公众人物,越要有良好的道德形象,越要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犯了错越要受到社会的谴责,付出相应的代价。政治人物不必说了,就是马拉多纳、齐达内这样的球星也不例外。而在当下中国,情况似乎是相反的。

什么时候,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变得如此粗鄙不堪,一个文质彬彬的民族变得如此斯文扫地,如此迷恋泥沼中的快乐?

二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市场经济改革以来,不可否认,我们在文化建设特别是其中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道德建设上下了很大的工夫,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理想泯灭、利欲泛滥、人文精神失落的现象,在90年代前期曾经十分严重,面对这种

提到空前高度,不过那不是心灵的解放,而只是肉体的放纵;自由的概念被滥用,但那只是一己的自由,却是他人的不自由;文艺界的“欢乐颂”不是真善美的颂歌,而是金钱的颂歌、身体的颂歌、为所欲为的颂歌;文艺家的特殊身份被强调——不过是强调要承担特殊的社会责任,而是拥有超越于芸芸众生的道德特权;坚守理想、追求崇高的作家被看成新左派、看成独断论者和专制主义者,遭到冷嘲热讽而孤立无援。精神上的侏儒化和庸人化,道德上的乡愿化,不但是许多国人的精神现实,也是部分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这样一种自我放逐和自甘堕落,使许多文化人不再有超远的思想、广博的心灵和宏大的把握能力,即使他们想这么做的时候,也往往是有心无力。思想的滑坡和艺术把握能力的下降是同步的,由此造成了深度的缺失,造成了对鄙俗的追逐与沉湎,造成了表

过现代主义思潮的颠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解构、商品化大潮的冲击后,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以真善美为最大追求的严肃的作家艺术家和文化机构仍然不少,但似乎已经被视为老土,被判定为落伍者,被事实上边缘化和小众化了。在台面上十分活跃的、既混了个眼熟又赚了大把银子的,是那些出位、搞怪、粗鄙不堪然而大言欺世之徒,是那些想象力贫乏、价值空虚但善于包装炒作的开卷榜首、票房“毒药”、收视冠军。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

文艺有多重功能,我们过去过分强调文艺的教育功能、社会功能乃至政治功能,把文艺弄得太严肃、太沉重、太小心翼翼战战兢兢,这当然是不可取的。但当前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矫枉过正?是否太过重视和开发了文艺的娱乐功能、休闲功能,而忘记了文艺的审美功能、教育功能和社会功

民性原则。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第22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人民群众是文化产品的创造者和享有者,文化精品来源于人民群众,服务于人民群众,最终应该由人民群众来评判”,这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在文化建设上的体现,也可以说是对文艺的人民性原则的重申。

因为有这样的群众观和文艺观,所以我们要根据时代的变迁和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化,适时调整我们的文艺观念。不可否认,当前的中国文化,已经出现了多样化、泛化和平民化的趋势。首先,社会文化的多样化乃至多元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时尚文化形成了共生共存、适度博弈的局面,多种文化之间有分有合,有重叠有差异,有互补有竞争,它们动态地处于一个文化共同体中。泛化是我用的一个概念,王蒙称之为“泛文化”。其特点是文学与非文学、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被打破,纯文学、纯艺术的概念遭到质疑,文艺的范围正在扩大,文艺的边界正在延伸,文艺作品在数量上如洪水漫滩,九派横流。再说平民化。从上个世纪前期开始,平民化或者说大众化就是中国文艺的一个梦想。从30年代的“大众语”运动,到40年代的文艺民族化争论,从1958年的“大跃进”诗歌,到“文革”中的工农兵写作,中国文艺一直在进行着大众化的不懈努力。但是,在一个前现代社会里,当人们的社会身份被打上了先天的烙印并被严格约束、当温饱仍然是大多数人的最大追求、当全民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为低下而传播途径被垄断,真正的文艺大众化是不可能实现的。而现在的情况已有极大不同,文艺不再是上流社会的专宠,而为广大的平民百姓所共享,创作不再只是专业作家艺术家的专利,而成为有文化有创意的普罗大众均可一试的爱好。专业与业余的概念已为职业与非职业的概念所取代。在这样的情况下,文艺必须眼光向下,强化底层意识,体现平民情怀,做到雅俗共赏、喜闻乐见;这样一种精神、这样一种理念,我想是应该继续倡导的。不能因为反对“三俗”,呼唤文艺的审美理想而让文艺回到说教文艺、贵族文艺、小圈子文艺的老路上去。

但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群众观和文艺观,我们不能任由文艺领域理想失落,低俗泛滥。为了继传五千年的文明传统,为了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为了真正成为当今世界的文化大国、文化强国,我们太需要提升文艺的品位和质量了。大师断代、经典匮乏、高端不举、深度缺失,这不是一两个精英分子的个人遗憾,而是人民大众的普遍感觉。在这样的情况下,还一味为世俗化唱赞歌,就真有点“拎不清”了。说到底,通俗无罪,但不能低俗甚至恶俗,应该俗为雅用,雅不远俗;适应大众的欣赏水平是对的,但引导也不可或缺;文艺的门槛在降低,但文艺精品的标准不能降低;文艺应该走入市场,成为产业,但社会效益永远是第一位的。

重焕理想,反“三俗”,文化主管部门肩负重大责任。人们所期待于他们的至少有两点:一是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文化理念,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公益性与商品性不能偏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二是要加强管理,“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两手并举。在市场经济中,逐利性是所有商品的共同特点,文化产品也不例外。作为管理部门,鼓励和支持文化产业是应该的,但更要强调和维护的恐怕是社会效益和公共利益。

文学理想与审美表达(3)

重焕文艺的理想之光

□龚政文

局面,文艺界、知识界在短暂的溃不成军后开始稳住阵脚,自我纠错。经过艰苦努力,进入新世纪后情况开始好转。但是,精神领域的某种滑坡、价值观的某种失范和无序的现象似未得到根本改观。“文革”对传统文化破坏的后遗症、中国式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的叠加,使民族的精神仍在十字街头中寻找方向,寻找支点,寻找安身立命的所在。而一些新的观念误区,或者说一些本来正确但强调过分的观念,又造成了新的问题。例如弥漫全社会的GDP崇拜,越来越把文化裹挟其中。尽管科学发展观已成为社会的指导思想,也成为全民共识,但惟GDP论仍有市场,体现在文化领域,就是只热衷文化产业不重视文化事业,只讲经济效益不讲社会效益,只想一朝把文化产业做成支柱产业而不管是否真正留下了文化经典。又如所谓“注意力经济”或者“眼球经济”,体现在文化领域,就是挖空心思提高收视率、点击率、上座率、发行量,而不注重文化产品是否有思想含量和艺术品质,是否有益于世道人心,以至出现了娱乐至上、票房毒药、同质化竞争等现象。再如成功学的滥用。有人说现代社会有三粒毒药:消费主义、性自由和成功学,成功学是危害最大的一粒。它以速成为噱头,以名利为药效,误导急于走捷径成为人上人的年轻人投身其中。延及文艺领域,便是普遍的浮躁,普遍的急功近利,希望一夜成名,一夜暴富。于是以大嘴毒舌搏出位者有之,以虚假宣传给自己贴金者有之,以抄袭剽窃牟取名利者有之。虽说是“全民写作”,其实泥沙俱下;虽说是每年长篇过千,但经典寥寥;虽说是频道数百,但一眼看去都在办晚会、造娱乐、播风格雷同的电视剧。

这是社会大环境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之所以出现审美理想的失落与畸变,文艺界主体精神的失落摆脱不了干系。出于对“文革”中假大空的反拨,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理论界出现了不少为文艺家减负的理论,如提倡“躲避崇高”,如不赞成文艺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提法,如认为社会功能是文艺的外部功能,作家只需要“写内心”,等等。这些片面的理论和市场经济初起时泛起的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合流,造成了知识界剧烈的道德滑坡和大面积的精神溃败。个性的解放被

面上的热热闹闹轰轰烈烈而经典阙如。从90年代以来,我们看到了太多的“新写实”作品,但几乎没达到批判现实主义的高度;看到了许多庸俗低俗媚俗的网文、图片、段子、小品、恶搞节目,是否在青少年心中培养着恶劣的审美趣味,传播着不良的价值观,从而会持续损害整个民族的精神文化素质?

文艺作品应该有益于世道人心,文艺家应该担当道义责任,任何时候,这都应该是对文化从业人员和文化机构的基本要求。伟大的作家艺术家,因其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对土地、人民、祖国的热爱,对人类最真实灵魂的书写与表达,而成为一个民族的良心,成为民族核心价值的承载者和传播者。屈原、鲁迅是中华民族的民族魂,巴金因为“讲真话”而成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良心的代言人。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也被公认为俄罗斯民族的良心。美国作家福克纳在1950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中明白无误地说:“人不仅能挺住,他还能赢得胜利……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内心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这些情操正是人类的光荣——复活起来,帮助他挺立起来”。在道德隐遁、价值失范、欲望膨胀、急功近利的今天,我们仍然需要福克纳式的作家艺术家坚守人类的基本价值,需要他们仰望星空,超越世俗,高扬人性的勇敢、善良与美好,投放出审美理想的灿烂光芒。比起福克纳们,当代中国的文艺家和文化机构,做的实在是太不够了。

那么,文艺的审美理想应该是什么样的理想呢?是丑陋的、怪诞的、庸俗不堪的、厚颜无耻的审美理想,还是以真善美为追求的永恒的、普世的审美理想?这本来也是不言自明的。但是,经

能?泛娱乐、浅阅读、一次性……是否让我们的文艺变成了营养稀薄的快餐和用过即扔的纸巾?而那些庸俗低俗媚俗的网文、图片、段子、小品、恶搞节目,是否在青少年心中培养着恶劣的审美趣味,传播着不良的价值观,从而会持续损害整个民族的精神文化素质?

文艺作品应该有益于世道人心,文艺家应该担当道义责任,任何时候,这都应该是对文化从业人员和文化机构的基本要求。伟大的作家艺术家,因其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对土地、人民、祖国的热爱,对人类最真实灵魂的书写与表达,而成为一个民族的良心,成为民族核心价值的承载者和传播者。屈原、鲁迅是中华民族的民族魂,巴金因为“讲真话”而成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良心的代言人。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也被公认为俄罗斯民族的良心。美国作家福克纳在1950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中明白无误地说:“人不仅能挺住,他还能赢得胜利……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内心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这些情操正是人类的光荣——复活起来,帮助他挺立起来”。在道德隐遁、价值失范、欲望膨胀、急功近利的今天,我们仍然需要福克纳式的作家艺术家坚守人类的基本价值,需要他们仰望星空,超越世俗,高扬人性的勇敢、善良与美好,投放出审美理想的灿烂光芒。比起福克纳们,当代中国的文艺家和文化机构,做的实在是太不够了。

四

重焕文艺的理想之光,抵制和反对庸俗低俗媚俗之风,这不是要让文艺回到单纯的政治说教,回到纯而又纯的状态,或者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阳春白雪、空谷幽兰。在这里,处理好通俗与高雅、低端与高端、普及与提高、适应与引导、大众化与精英性等一系列关系,是文艺界永恒的课题。而其核心,我以为是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和“人民性”的文艺观。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人民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也理当成为文艺的主体。列宁和毛泽东更是确立了文艺的人

乡土文学依然需要大手笔

在今天,乡土文学依然要有大手笔。尤其在这样一个文学商品化的文化快餐消费时代,乡土文学急需实践它文学的崇高承诺。乡土文学的意义就在于能够深入到人性的本质,挖掘与发现卑微生命里所彰显出的莫大张力与能量,甚至是纠结于一场悲苦的对抗与斗争,却能就此探索出一个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价值认同,那就是“活着”。苦难,让文学认识到了“活着”的伟大,除此以外,还需要什么更多的意义?然而,几乎在所有被商品化的文学里面,我们却很难再读到关于生命的文字,文学也似乎在渐趋远离着我们的生活。乡土文学正是要在这样的背离中出发,来承担起对生命的思考与对人生意义的探索的义务。

上个世纪末,在祖国西部的黄土高原曾经产生了一个蜚声全国的“西海固作家群”,作家群里的每一个作家都像是在复活乡土的记忆,写尽了西海固的千沟万壑。黄土地、耕牛、窑洞、大山、煤油灯,魂牵梦绕的总是贫瘠的土地与苦难的岁月,无不蕴藏了对坚韧生命的莫大同情和赞礼。好的乡土文学作品,总是在启人契合宇宙的隐微,契合生命的高贵与蓬勃的创造力,予人于隐微中把握人性的真善美。而这些价值,也同样是文学所要肩负的承诺。乡土文学没有过时。乡土文学也应该遭受冷落。乡土文学依然要有大手笔。这里所说的大手笔,就包括着大作家、大作品和大规划。同样,乡土文学也是一个生命。在21世纪的今天,她能否在商业化文学的排挤与市场的打击中依然挺拔,是与她笔下的生命有着相同的考验,那就是卑微中的高大,脆弱里的坚韧。

读者评论

刘智远(湖南)

集中解读公安文学之作

□张永健

警察是和平时期最危险、牺牲最大的一种职业。人民警察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可爱的人”,宣传其典型事迹、为他们树碑立传、为公安事业鼓与呼,公安作家责无旁贷。湖北警官学院张友文作为公安文学作品的点评者与公安作家们一道谱写英雄情怀,为人民警察喝彩。他的第二本公安文学评论专著《聚焦公安文学》最近由珠海出版社出版。此作从解读21世纪的公安文学入手,除了颂扬警察意识,讴歌警察精神之外,重在发掘文本中的审美意蕴。

20世纪80年代公安文学曾经热闹过一阵,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加之西方思潮的影响,文学逐渐边缘化,公安文学似乎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实际上,警营作家一直在默默地耕耘,并生产出了大量的高质量的公安文学作品,只是文艺理论工作者

很少关注罢了。

近几年来,友文潜心研究公安文学,重提公安文学,集中解读公安文学作品,再次让公安文学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他的第一本个人专集《点击公安文学》还获得过国内首部公安文学评论专著《聚焦公安文学》最近由珠海出版社出版。此作从解读21世纪的公安文学入手,除了颂扬警察意识,讴歌警察精神之外,重在发掘文本中的审美意蕴。

《聚焦公安文学》将公安小说、诗歌、报告文学、电影剧本等进行分门别类的言说,重点探究这些作品之所以打动人、吸引人的原因之所在,即追问公安文学作品制造的效果。如《人事风波》——评孙学军的文学作品,就是从心理角度着手,深层次地开掘人民警察的内心,直面警界复杂的人际纠葛,堪称真实独到。公安作家王仲刚的电影文学剧

证不一定充分在理,至少找出了历史的碎片,有重写文学史的味道。

作为一名人民警察,友文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实事求是地点评,并进行系统地爬梳,这是需要勇气和定力的。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在这个功利色彩较为浓厚的年代,他拒绝“红包”评论、广告评论,仗义执言,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力求达到“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

公安文学作品大都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因此,友文在评论时,力求用中国文论指引自己前行,并没有追赶上潮流,即用西方文论来装点门面,卖弄学问。如《传承楚文化 再兴“赶五句”》一文就是发杨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肯定词作家程建国的成绩,用“透视主义”来看作品,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反响。

警察是和平时期最危险、牺牲最大的一种职业。人民警察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可爱的人”,宣传其典型事迹、为他们树碑立传、为公安事业鼓与呼,公安作家责无旁贷。湖北警官学院张友文作为公安文学作品的点评者与公安作家们一道谱写英雄情怀,为人民警察喝彩。他的第二本公安文学评论专著《聚焦公安文学》最近由珠海出版社出版。此作从解读21世纪的公安文学入手,除了颂扬警察意识,讴歌警察精神之外,重在发掘文本中的审美意蕴。

20世纪80年代公安文学曾经热闹过一阵,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加之西方思潮的影响,文学逐渐边缘化,公安文学似乎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实际上,警营作家一直在默默地耕耘,并生产出了大量的高质量的公安文学作品,只是文艺理论工作者

本《风流警察亡命匪》在问世之初曾经引发热议,主要是关于其中的警察形象说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如今,友文站在较为客观的立场上,并结合当前的公安工作重新阐释,尽管论

证不一定充分在理,至少找出了历史的碎片,有重写文学史的味道。

作为一名人民警察,友文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实事求是地点评,并进行系统地爬梳,这是需要勇气和定力的。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在这个功利色彩较为浓厚的年代,他拒绝“红包”评论、广告评论,仗义执言,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力求达到“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

公安文学作品大都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因此,友文在评论时,力求用中国文论指引自己前行,并没有追赶上潮流,即用西方文论来装点门面,卖弄学问。如《传承楚文化 再兴“赶五句”》一文就是发杨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肯定词作家程建国的成绩,用“透视主义”来看作品,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反响。

《聚焦公安文学》将公安小说、诗歌、报告文学、电影剧本等进行分门别类的言说,重点探究这些作品之所以打动人、吸引人的原因之所在,即追问公安文学作品制造的效果。如《人事风波》——评孙学军的文学作品,就是从心理角度着手,深层次地开掘人民警察的内心,直面警界复杂的人际纠葛,堪称真实独到。公安作家王仲刚的电影文学剧

让父母做回有钱人 捕鱼者说 三 石 为什么帮不到我 一杯月光 翻脸 李伟明 两只狐狸的爱情 天 宇 九步之暖 朱 琦 木爷爷的机灵 林华玉 水泊梁山 刘 林 炒人风俗 海棠依旧 狗獾 王振东 雪晨 聂鑫森 公投 刘向阳 男人是药 邵火烽 金婚之约 肖春青 当个“英雄”不容易 孙毛伟 卖新闻 胡 妍 夏 阳 徐常渝 秒杀 慕皓月 人民的羊 王凤国 “光棍”鱼蛋 孙玉亮 会唱歌的鱼篓子 谢志强 约好了春天开花 米粒儿 目击证人 袁炳发 回拽 乔 迈 琥珀手链 聂鑫森 最好的作品 何一飞 幸福的子弹 刘 林 陈亦枝 乔 焱 神秘的古堡,神秘的画面 秦德龙 真实有代价 嘉 山 一次性动作 万俊华 错误 张智强 三张卧铺票 范大宇 绝编 江 离 赖财 马孝军 七年不抵六十天 朱慧彬 奴才 常聪慧 祝你骗得成功 秋雨菲 父亲的吻别 李洪涛 一只丢失的花鞋 王 悅 城市中央 常聪慧 那时的爱情 杜伟伟 父母的爱 张 丽